

俄、毛共圖逐步併吞自由世界

饒大衛

這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饒大衛 (Prof. David N. Rowe) 最近在維吉尼亞州的 Richmond News Leader 發表的專論。承中央社提供全文譯稿。特為刊出，具見作者考據客觀，判斷正確。

——編者

一九七四年的十月一日，美國勞工聯盟主席閱尼，在參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曾經如此說道：「今日，和平所面臨的最大威脅，莫過於我們之未能面對現實的世界，無法洞察各地的自由的敵人之本質。」

今天，我們似乎真已身陷此種危局，真有毀於敵人手上之虞；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家已經充斥了有關我們的大敵——中共與蘇俄——的宣傳所致。在尼克森、季辛吉追求所謂「和解」的行動下，隨之俱來的這些宣傳，不實的將這些自由的敵人，描寫成真正的或潛在的「朋友」，把它們說成可以在互惠的基礎下，彼此來往的一羣人。

事情的真相則大非如此，現在也該是我們猛省的時候了。事實上，中共與蘇俄一直都是美國最危險的死敵，不斷在企圖摧毀美國，尤其是因為他們所使用的兩套戰術，到目前為止均相當的成功，這才顯得更加危險。這兩套戰術即是「和解」以及循序漸進的一套侵略方法，亦即我所稱的「逐步暗殺」策略。

首先，說到他們對美國的敵意及其最後終將摧毀美國的意圖，我們只須注意其言論即可明白。他們一直明白而率直的說出他們對美國的意圖。例如，從列寧以次，一直到布里茲涅夫，蘇俄即經常公開談論其欲摧毀美國的企圖。即便是希特勒，在其「我的奮鬥」一書中，也不能說得較此更為露骨的了。這是列寧在一九二一年的一段話：

「全世界的資本主義者及其政府，在其爭相奪取蘇俄市場之際，將會閉眼不顧現實，因而變得又盲又聾又啞。他們將會提供貸款，而此則可用以支

持他們國家裏的共產黨；他們也將提供我們重要的物質和技術，因而使我們得以恢復軍事工業，這對我們日後之制勝我們的供應者，乃是極為重要的事。換句話說，他們將會自尋自殺之路。」

布里茲涅夫在一九七二年，談及他所謂的「思想鬥爭」時，也曾說道：「我們必須要為鬥爭的加強，並成為兩種制度之間日益尖銳的衝突形式預作準備。」

當然，這種鬥爭並不限於思想方面，即在軍事方面亦復如此。關於這點，試看尤金·羅斯托教授於四月四日在洛杉磯所說的一段話：「蘇俄的政策與過去並無不同，只不過是其壓力較前更大，方式更有變化，亦更難應付罷了。它仍繼續謀求以軍事預算為後盾的擴張計劃，其軍費預算一直以每年百分之五的比例在增加，這在現代史上是無可比較的。」

在這方面，中共亦不後人。今年的四月一日，張春橋曾如此寫道：「只有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才能獲得最後的解放。要想達到此一目標，唯有對資產階級實施全面專政；並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到底。」

而其北韓共黨夥伴則甚至在其郵票上言明：要在「世界各地，消滅所有美國人，將其撕成片片！」

他們對美國既有此等企圖，何以又能與美國進行「和解」呢？這大半是美國政府在季辛吉的協助下，由尼克森始作俑，而造成的錯誤。在其溫和的影響力之下，大家沉溺不察，對共黨及共產黨徒產生了荒謬的和樂之感，而在同時，反而認為反共人士是「極端份子」，具挑釁性。言下之意，似乎是

敵人還須有美國的撩撥才會行動的樣子。在這種笑臉攻勢下，美國即致力欲與北平的毛派黨徒建立友誼，締結「正常化」的關係，並與蘇俄攜手，共謀摧毀美國用以抵抗其攻擊的國防力量。在此過程當中，美國不啻與這兩個共黨敵手，協同一致，促成我們在越南及東南亞其他地區之反共盟邦的覆亡，從而亦使美國首次遭到了美軍在戰爭中失敗的苦果。

在追求這虛幻的「和解」過程當中，我們聽任蘇俄將其軍力發展到凌駕於美國和西歐盟國之上，而我們未能支持越南盟邦的屈辱行爲，更使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盟友爲之氣餒。由於美國試圖拉攏毛某，欲以之抵制蘇俄。因此對其無視於一九七三年的越戰停火協定，明目張膽的行爲，只好視若無睹。（真不知辛辛吉在他訪問北平的時候，究竟談了些什麼？）事實上，美國的越南政策之失敗，乃是蘇俄與中共那種協同並進之作法的一個絕佳例子——此即彼此以公開的政治對抗，乃至軍事對峙的姿態爲掩護，而對非共世界分頭進行其共同的侵略政策。蘇俄與中共在這種共同對付越南的政策裏，彼此之間其實協調甚佳，各自劃分了責任範圍，消除了重複的行爲，更一致堅持行動到底。

美國爲了補救它在越南的慘敗，又能做些什麼呢？它能做的只是收容那些設法逃出共黨統治的少數越南人民而已，比起那些目前要遭其舊敵手、新主子所清算的數百萬越南人民來說，這些有幸逃生的越南人，實屬少數。還有一個事實：過去，爲了脫離共黨暴政，而由北越逃往南越的，單是天主教徒，即有將近一百萬人之多。有沒人想到他們現在會有何種待遇呢？爲了進一步補救疏忽越南問題所造成的罪過，美國還動用了佔盡優勢的海空軍力量，擊沉棉共的若干砲艇，救回一艘美國商船。然而，即使是這樣的一場小「勝利」，竟也要遭到像我本州的康涅狄克州州長葛拉索這類人的批評，說是「反應過火」呢！

至於共黨的其他戰術，亦即我稱之爲「逐步暗殺」的那種漸進式的侵略，又當如何呢？這種戰術的淵源，似乎還是來自共黨集團，而爲我方所少有——那就是，一種研究歷史、並從中獲取教訓的能力。這裏所涉及的問題是：『要如何才能使美國及美國人民起而採取有效的軍事行動，來援助他們抵抗敵人？研究了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所參與的各次重大衝突之後，其答案已清晰可見。從美國的歷史看來，它多半總能藉着依賴別人的政治安排，以及

俄、毛共圖逐步併吞自由世界

（或者）軍事上的權宜之計，及其地緣政治上的距離關係，而獲得初步的防衛。在期望避免捲入這些嚴酷而耗資甚鉅的軍事對抗之際，美國就常會有一段相當的時期內，一任自己站在一旁不安地搓着手，試圖「立法」，使自己免除困難，拒不動員像實際的軍事潛力這一類的力量，並在同時聽任別人在打美國的仗，而讓美國還在一旁盤算究竟應該如何去做。舉個例子，日本若是瞭解這點，而略過美國的領土，讓美國能「和平」的生存的話，那它或許將可佔據了整個東南亞和南亞的大部份地區。可是，他們覺得這未免風險過大，因此即在菲律賓和夏威夷攻擊美國，這才給了美國一個重大的軍事挑戰，只因爲日本這麼做，美國到這地步，才終於全面參與對抗軸心國的戰爭。

今天，美國的共黨對手在這方面則遠爲狡猾世故。也因此才顯得更加危險，甚至較諸希特勒、東條、或墨索里尼的全盛時期還要危險。事實上，他們採取的是一種「千刀萬剮」的蠶食手段。這也就是說，至少到目前爲止，他們一直很成功的避免使其侵略在任何一處引起太多的傷害，以免令我們在遭到切膚之痛之餘，警覺到危險，從而不計代價的起來反抗。至少對美國而言，共黨所施的這些「刀傷」尚無處真能嚴重的威脅到美國。因此以越南的災禍而論，福特總統遂即呼籲美國民衆往事莫追，勿再交相指控，亦即忘懷此事。據其說法，越南之慘敗對美國的重大利益並不構成威脅。它可能有些損害，却不至於要命。

共黨即是存着這種念頭，而想在最後致美國於死亡的。這真是「逐步的暗殺」，因爲經歷了這一連串看來似無大害的「小傷」之後，要想不致在最後引起嚴重的創傷，從而致死，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即便是在對方已無餘力反抗的情況下，以這種漸進的方式來將受害者凌遲至死，也總比令其一刀致命要高明些。因爲在這種凌遲的過程中，正如中共以其公審、入罪和行刑所顯示者，其所附屬的效果是極爲重要的。這種在受害者終告致命之前，以一連串小小的割傷來令其萎頓的作法，乃是頭腦對於肉體的一項最後勝利——亦即劊子手的頭腦對受害者的肉體的一項勝利。

其效果是可以無需毀掉整個軀體而令其致命。在這情況下，受害者甚至不會因爲流血過多而死。如此軀體還可保留得完整些（而以美國這麼一個大國爲例來說），使得劊子手可以利用其剩餘價值，而謀更大的利益。舉個例子來說，有誰能够懷疑在這麼一套成功的加諸美國頭上的「逐步暗殺」政策

之下，美國人民及其領土仍具有相當的價值，而值得加以佔據、統治呢？這答案真是明顯可知；太明顯了，以致我們很少會思及這點。

在多數的美國人看來，像這樣直說人們具有這類想法和計劃的事，無異是在訴說人們具有一種全無人性、殘酷惡毒的罪行，以致反而容易令人對作此指控者的真實性發生了極大的懷疑。不過，今天的美國人最好是放棄他們那種看待其他人的天真態度，否則他們可能不久即將身陷其境。當然，美國對於希特勒及其黨羽的暴行，最後總算採取了行動，但在此之前，有一大部份的時期，美國却仍將信將疑，一直到它親眼看見了在貝森這一類地方所進行已久的暴行之後，才真相信確有其事。

由此看來，假如還是需要再有一次「珍珠港事變」，亦即必得要有直接攻擊美國本土的行動，美國人民才會警覺到危險，甚或致命的危險的話，我認為那是相當不幸的。在今天，即使我對蘇俄與中共的這種對美戰略的分析，只有部份正確無誤，亦仍少有可能會由共黨方面對美國發動這類直接、明顯而無誤的攻擊。這裏之所以提到另一次的珍珠港事變，用意無非是在強調美國一直沒有瞭解在越南、高棉、寮國和以色列、葡萄牙，以及其他許多地

方所正進行的實際情況。其實，以上這些地理名稱和政治稱號，全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實體——亦即自由世界——裏的成員。因此，若對其中的任何成員發動武裝侵略或是政治侵略，即不啻是在攻擊美國。即便此種攻擊事實上尚未指向美國的心臟，或其他的重要部位，其對美國的危險性仍不因此稍減。

今天，我們的處境所以會如此危殆，即是因為我們似乎還不明白這層道理之故。

就美國而論，針對此種無知或是誤解的態度，唯一的對策，便是澈底修正我們對世界事務的想法，這種觀念的修正，則應以自由世界各個成員在其面臨重大危機而奮力圖存時的相互依存性為基礎。在這方面，高階層的領導當局負有一個特別的、並且是相當沉重的責任。以目前的情況而論，舉個例子來看，這裏所顯示的教訓便是，福特政府應即停止其將越南政策的錯誤謬誤過去，而妄圖修補掩飾的做法。其實政府應與民衆一齊發起一項審慎、誠正而有系統的研究，以明白美國究竟錯在何處，如何可以避免這些錯誤。如果這種做法意謂過去的錯誤將會為日後帶來相當的政治代價，也只有由它去了，因為這總比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情況，而使國家的生存在將來受到危害要好多了。

三木訪美與美日關係

朱少先

一 三木訪美前的部署

三木武夫出身改進黨，在自民黨內屬所謂「保守旁流」，因思想中間偏左，向被列為鴿派份子。過去曾數度競選總裁，均告失敗，在黨內力量有限。去（一九七四）年中被迫辭職，在福田赴美與大平正芳兩派相持不下狀況中，由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裁定，始脫穎而出，担任自民黨總裁成為日本首相。

在其就任之初，因國內政局不安，雖有訪美之意，但仍不敢輕易出國。加以當時通常國會正在進行，事實上亦無法抽身。到今年一月自民黨定期黨大會中一致追認三木總裁地位，使政權亦稍趨安定。同時今年四月，高棉、越南相繼淪陷，北韓主席金日成又在四月十八日率領大批軍政高級幹部訪問北平，使東北亞形勢驟然轉緊；尤其是韓國方面，北韓隨時有發動南侵可能，日本安全已直接受到威脅，因此急需謀求應變之策；而這些問題，必須與美國取得協調與合作。所以才有了訪美的積極準備。但由於三木本身，因其